

山东在区域合作中扮演着沟通东西、联通南北的“丁字路口”角色

加快建设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

□ 魏建

第一落点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要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山东地理区位优势条件独特，经济体系相对完整，经济体量居全国第三，北方第一，人口过亿居全国第二、北方第一，具备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良好基础。近些年来，山东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全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今后要以更高的站位，积极主动担负更多区域协调发展责任，通过多维战略布局推动区域战略联动，加快建设成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

充分发挥“丁字路口”作用

山东在我国区域合作中扮演着沟通东西、联通南北的“丁字路口”角色，这一地位使其在国家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东西横向上，山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下持续深化与沿黄省区的合作，与西部省区在对口支援、结对帮扶等促进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南北纵向上，山东地处京津冀、长三角之间，经济、社会等方面联系密切，与东北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华东沿海其他省区也颇有渊源。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不仅要肩负强省建设的重任，更要肩负以“龙头”带动沿黄省区共同实现现代化的使命。勇挑重担就要积极融入京津冀、积极对接长三角。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过去主要重视东西协调着力缩小东西差距，对于东部之间协调合作着力较少。今年山东省出台《山东省深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三角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且和京津冀、长三角等省市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对接合作还存在不足。一是合作的领域、层次、深度都有限；二是合作更多的是由山东主动提出，或多或少得到了合作方的认同；三是国家层面缺少促进东部合作的总体战略。因此，笔者建议“十五五”期间研究出台促进东部合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明确协调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促进合作的制度安排，赋予山东、上海这样处于丁字口战略位置的省市以重任和相应的支持政策，并进一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成为“十字路口”。

全方位深化区域合作

在现有区域合作基础上，山东应进一步明确合作重点，通过深化区域之间的交流，形成动能强劲的新增长极。

西向方面，要继续充分发挥山东带动黄河流域发展的龙头作用，强化鲁豫陕合作，以鲁豫

陕合作带动全流域的发展。2024年山东与河南联合发布了《鲁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在豫鲁毗邻地区深化生态保护、防洪减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探索“流域+省际”区域合作新模式。山东要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和建设鲁豫陕科创走廊。山东、陕西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鲁豫陕三省产业存在较大合作空间，且区位优势便于接受来自北京的科研辐射，河南和山东已经提出共建鲁豫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并向科技部报送了相关规划。陕西可以积极参与，推动三省共建科创走廊，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同时，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将鲁豫陕科创走廊建设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

北向方面，要扎实对接京津冀行动方案的战略设想，特别是瞄准京津冀的科研、文化、金融优势发力。专项梳理山东产业发展需求与京津冀科研供给之间的潜在联系，进一步优化成果转化政策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建设京津冀科研成果转化专区，推动京津冀科研成果优先落地，加大与京津冀文化优势机构合作力度，深化在文化建设、旅游开发领域的合作，加快将山东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资源。北京金融资源丰富，不仅金融机构的总部均聚集北京，而且有北交所、银行间市场等金融市场，山东要加大对接力度，同时探索在绿色金融、科创金融、养老金融以及金融科技领域进行合作创新，共同打造现代化金融示范。

南向方面，山东要更加积极地融入长三角。加快共建高能级科创平台步伐，落地建设一批研发中试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在先进钢铁材料、智能交通工程联合等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现有园区与长三角共建合作园区，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重点包括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打造数字经济高地及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探索联合开发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合长三角高校及科研机构（如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攻关核心技术，推动山东半岛与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扩大科技资源共享范围，实施高层次人才挂职交流政策，促进科技创新深度合作。

东向方面，随着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韩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山东要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建立与日韩更加全面和稳固的经济合作。深化海洋经济合作，加强港口互联互通，海洋科研与生态保护，共建海洋经济示范区。引入日韩农业精细化管理技术，开展育种、种植等技术合作，提升山东农业现代化水平。发展医养健康产业，引进智能化老年产品，推动日韩养老服务业态与山东资源结合。成立中日韩银发旅游联盟，开发长期留宿项目，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优化人才政策，试点日韩技术技能人才就业居留便利化，推动“候鸟型”人才引进。

以毗邻区域一体化为突破口。区域一体化

是全域一体化的起点，要积极推动山东与周边区域毗邻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尤其是以交通的高水平互联互通为切入点推动省区之间的合作。菏泽、聊城、德州、枣庄等要全面消除与毗邻省区断头路现象，通过公路、铁路、航道等形成密切的交通网络格局。同时，强化在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市场建设等领域的协同共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以毗邻区域的一体化带动省区之间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大力推进数智化转型

当前，我国传统产业智能化渗透率较低，全国规上企业数字化覆盖率不足70%，小微企业的数智化水平更低。中国北方是传统制造业的聚集区，黄河流域多数城市的主导产业集中于装备制造、传统能源化工等领域，相互之间缺乏差异化定位，导致区域间竞争加剧。如山东化工产业长期居全国领先地位，但周边省份也普遍布局重化工。产业同质化导致竞争加剧，低效竞争，严重制约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山东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中，要以传统产业的数智化为核心，在为北方区域产业升级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也通过数智化促进形成协同发展、合作竞争的良好格局。近年来，山东通过龙头企业引领，在纺织、机械、化工、家电等领域打造智能化标杆，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数智化升级工程，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势转化为数智化优势。国家级智能制造工厂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8家“灯塔工厂”和35家国家级智能工厂，拥有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等46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居全国第一。在这个过程中，依托链主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实现上下游数据贯通，全产业链协作效率显著提升，产业集群实现智能化升级。

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智化升级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协同，形成产业错位、良性竞争格局。山东依托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如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和省级平台，构建了覆盖黄河流域的数字化服务网络。2024年山东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超1000万台设备，服务全国300万家企业，为沿黄省区提供设备管理、供应链协同等数字化解决方案。通过“链长制”，“工赋山东”，“产业大脑”等行动，汇聚产业链数据，推动海尔、浪潮等龙头企业与沿黄省份共建数字产业链，用好黄河工业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实现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多元算力的统一协同调度。

今后，北方各个省区要积极协调，共同出台推动产业数智化深度合作的制度安排，山东要着重强化与周边区域在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领域的合作，推广可复制的“产业大脑+晨星工厂”等数智化模式，加快数据标准化步伐，使数智化成为产业协同的基础。建立“产业链图谱智

能匹配系统”，利用AI分析各省资源禀赋，自动生成协作项目清单，避免重复投资，建设全国东西部产业协作大数据中心，集成政策、人才、资金等要素，实现项目智能匹配与风险预警。

完善生态协同保护制度体系

中国北方区域是生态约束相对较强的区域，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生态脆弱区域较为广泛。当前已经有了生态补偿和碳汇交易的实践，但还没有构建起覆盖全区域的生态协同保护制度体系，没有形成常态化的生态交易市场。山东要在生态协同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继续深化省域内区域之间协同保护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牵头促进建设北方生态交易市场。推广和落地应用山东在碳汇核算、交易定价等方面的技术和制度安排，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奋力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领先省份。

一是健全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2021年山东省与河南省签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成为黄河流域首个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山东还在省内建立县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深化了河流上下游的协同治理。借鉴山东的做法，省域之间、生态区域之间都可以建立相应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样与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纵向补偿相结合，从而形成纵横结合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

二是建立生态权利交易市场。推进生态资产确权登记，完善定价机制和分配规则，制定统一的GEP核算规范。实施碳普惠计划，加快建立水权交易、草场森林碳汇、湿地碳汇等跨区域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形成北方区域生态交易市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化常态实现。2024年黄河流域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在宁夏银川签约，随后陕西延安、甘肃庆阳等地也相继完成交易，东营市三角洲养殖繁育有限公司完成首笔海洋生态修复碳汇交易，这些交易通过监测核算碳汇量并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有效促进了当地生态建设。

三是进一步优化八七分水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供给的再平衡。水资源是北方区域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八七”分水方案），规定了黄河流域各地区的用水量分配。该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细化为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为缓解黄河断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上升、南水北调工程建成投运以及地下水等因素的影响，“八七”分水方案已不能适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and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黄河流域省区以及用水地区要积极协调、科学测算，尽早形成新的分水方案，强化管控、推进水权交易，加快形成高效节水用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

打造赛事经济，谋求城市发展新机遇

马拉松缘何成了城市“香饽饽”

□ 李艳丽 李焱

“新经济”系列观察

这个春天，体育赛事热闹非凡。刚刚过去的星期日（4月20日），全国有43场马拉松比赛同时举行，这成为中国马拉松官网记录中迄今举行马拉松比赛数量最多的一天。

近年来，赛事经济持续升温。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哈尔滨亚冬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相继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举办城市的发展活力。“村BA”、马拉松等群众性赛事与特色活动层出不穷，在大江南北掀起一波波全民健身热潮。在近期全国各地发布的提振消费实施方案中，多地将体育赛事列为重要手段。体育赛事在提振城市消费、塑造城市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等多维度释放效能。众多城市纷纷通过打造赛事经济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各地掀起一股“以赛兴城、以赛营城”的热潮。以体育赛事为触媒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培育城市新动力的战略共识。

火热之势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赛事热潮。作为城市发展新动能，体育赛事开展如火如荼。赛事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以北京为例，2019年至2023年，北京体育赛事举办数量由474项次增长至975项次，增长105.7%，2024年赛事数量突破1000项次。同时，举办赛事的城市逐步向全国多层次覆盖。单以路跑赛事来看，2024年全国共举办671场，赛事分布范围涵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1个市，537个区县。中国田协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范围内共举行马拉松比赛696场，较2023年增长约12%。赛事突破传统核心城市边界，呈现全国多点开花态势。

赛事类型逐渐多元。如北京冬奥会、上海F1赛车、CBA联赛、贵州“村BA”、马拉松、户外越野、滑雪等等，从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到地方性赛事，既有观赏型又有参与型，既有竞技类赛事，又有群众性赛事，满足大众对体育赛事的多层次需求。

赛事规模效应凸显。亚冬会从赛事筹办到赛会结束，特许商品累计销售额超6亿元，并且

在亚冬会叠加效应的推动下，哈尔滨春节假期接待游客1215.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入境游客激增144.7%；大运会带动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438.3亿元，同比增长14.2%。赛事的规模效应不仅体现为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通过城市更新、产业协同、全民健身等多维度形成综合性溢出价值。

发展之道

举办体育赛事不是简单的一场竞技狂欢，更是通过赛事流量实现对城市的系统性赋能，重塑城市发展范式。

以赛兴旅，释放城市消费活力。“因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赛事活动不仅激发本地居民参与热情，更吸引海量外来观众和游客涌入。除了门票、赞助等直接收益外，还带动“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链式消费，城市经济潜力得到有效激活，实现赛事“流量”带动消费“能量”，进而转变为经济“增量”。体育赛事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质等方面带动效应凸显。

以赛惠民，织就美好生活图景。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舞台，还是改善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引擎。一是体育赛事推动体育基础设施优化升级。近年来各城市大力推进体育场馆、绿色健身步道、体育公园等改造、建设力度，打造“15分钟体育生活圈”。二是体育赛事赋能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结束后，相应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模式向市民开放，同时赛事的组织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三是体育赛事带动就业增收。以青岛市为例，2024年因赛事而新增就业岗位数约3.28万个。

以赛促融，助力产业融合发展。作为体育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体育赛事产业正加速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创新培育体育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例如，“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活动持续推进，有效促进体育与商务、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赛事+”推进多元产业融合创新，带动城市体育服务业的增加值不断提升，激发赛事融合效应，牵引城市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智能化转型，为城市产业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以赛塑名，打造城市独特品牌。体育赛事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具有显著的溢价效应。一方面，高质量赛事筹办倒逼城市从交通、基建、公共服

务、城市治理等多维度系统性升级；另一方面，赛事构筑起立体化城市展示平台，成为城市品牌传播的“黄金媒介”。尤其是国际大型赛事会吸引全球媒体关注，使得赛事形象与城市特质形成深度绑定，可以快速提升国际知名度与美誉度，增强了投资与人才的吸引力，赛事长尾效应显著。

以赛传魂，城市文化基因有效激活。体育赛事构建起“本土特色文化”交流的桥梁。以贵州“村BA”为例，将侗族大歌、苗族芦笙、摆王木鼓等非遗元素以及当地民俗、特色美食通过赛场景展现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凸显当地文化特色。同时，体育赛事作为城市文化的“集体仪式”，实现了民众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信。

当下之困

在各地政府以赛事为抓手，加速推进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大众需求多元化，赛事供给模式固化。目前许多城市在赛事项目设计和服务供给上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赛事组织单调，内容单一，导致大众体验感与参与感不足，难以有效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赛事发展受限。

赛事资源配置不均，区域发展差距明显。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因其具备更强的赛事承办能力和资源吸附能力，资源高度集中，国际顶级赛事或知名品牌赛事多集中于此。相较之下，城市层次越下沉，其在基础设施、人才、融资能力等方面制约性越高，较难获得优质的赛事资源。赛事的举办过多依赖于上级财政支持。这种不均衡分配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差距，致使“马太效应”愈发凸显。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长期效益难以持续。许多城市在举办体育赛事时，仅关注短期的经济拉动效果，前期缺乏对赛事的长效机制规划与设计。赛事结束后，客流迅速减少，相关消费需求大幅回落，导致赛事“一次性消费”特征明显。部分城市赛事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未能与日常城市运营相衔接，赛后设施利用率较低，维护成本却居高不下，甚至造成财政负担，造成资源浪费。

体育赛事同质化，品牌形象力不足。在体育强国战略与赛事经济的多重效益驱动下，各地政府竞相举办类似赛事活动，不免出现盲目跟风现象，缺乏鲜明的城市办赛特色，致使号召力

不足，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吸引力，使得赛事同质化问题加速显现。

破局之解

构建城市赛事矩阵，满足多元化需求。当前，马拉松、户外越野、村“BA”、短道速滑等赛事关注度持续攀升，反映出大众对体育赛事需求向分散化、垂直化深度拓展的趋势。构建“纵贯层级、横拓场景”的网格化赛事体系，纵向形成“顶级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支撑、全民赛事筑基”，横向实现“运动项目多元化、赛事模式创新化、参与主体圈层化”。通过赛事矩阵布局，实现体育服务供给能级的提升，不仅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而且有效激活全年龄段体育消费势能。

统筹区域赛事资源，释放协同发展效能。受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差异制约，城市的体育赛事市场发展程度不一，且单一城市难以独占赛事产业链全要素。因此，跨区域资源整合成为破题关键。比如，通过场馆共享、技术互通、资本与专业人才共融共生，建立标准协同等搭建区域资源配置网络，实现“乘数效应”。尤其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将赛事品牌溢价与集聚效能向邻近地区传导，反哺欠发达地区，形成区域协同发力态势。

拓展赛事价值，培育长效发展生态。深度挖掘、开发赛事价值，突破“赛时经济”短期效益思维，转向全生命周期运营。从规划层面，将赛事纳入城市长期发展战略，明确赛事与相关产业联动路径；从运营层面，除了拉动与赛事相关的运动服饰、装备等实物型体育消费之外，体育赛事赞助、无形资产开发亦是赛事经济的重要一环。在社会文化层面，将赛事遗产融入城市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优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将赛事活动转化为城市记忆符号，将赛事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因地制宜办赛，破解同质化困局。一是增强体育赛事与城市的共生性，挖掘城市资源禀赋，结合当地文化底蘊、特色产业及自然资源，策划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赛事IP，避免“千城一面”。二是提升赛事创新能力，以技术赋能，如融入智能科技、虚拟现实、沉浸式互动体验，推动赛事体验升级，持续提升赛事独特性与品牌价值，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

（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

城市的发展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支撑引领，高等教育发展也需要城市的滋养助推，城市及其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着教育强国的建设。笔者通过深入系统研究发现，非省会城市高等教育发展还存诸多问题挑战，从动力学视角看主要存在城市政府经济支撑力和行政推动力偏弱，市场参与动力不足，高校从城市获得的推动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和挑战。应对这些问题挑战，可着重从城市政府、市场和高校三个维度系统谋划和发力，有的放矢地采取三方面的策略。

一要给城市政府授权和增压。针对城市政府经济支撑力和行政推动力偏弱，首先应进一步增加和明确城市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权责。非省会城市对高校的行政管理推动力不足，原因主要是国家和省级政府授权不够，国家和省级政府应科学合理地授予更多更管用的实权给非省会城市政府，使其管理所有的驻地高校出师有名、名正言顺。可以采取中央、省、市三方共建或者省市共建共建的方式，给城市政府管理服务高校赋予更多的权责。可以在每个非省会城市确定不少于一所的城市合建高校，建立更加有利于合建高校快速发展的制度机制，赋予城市政府更多更实的管理该高校的权力。比如，对省市合建的高校，赋予城市政府对高校基本建设的审批立项权，对于完全由市政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由相关部门批准进行立项、建设审批以及监管；省财政和市财政联合投资，以市财政为主的建设项目，经省主管部门备案，由市相关部门进行立项、审批和监管。由此便可更好地调动城市政府管理服务高校的能动性和权威性。其次，应建立科学务实的城校互动互助机制，增加城市政府对驻地高校建设和监管的责任与压力。建立更加科学务实管用的城市与高校的互动互助机制，首要的是城市政府应更加主动、更加担当，发挥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要推动高校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要求，紧紧围绕城市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发展需要服务和办学，实现双向奔赴。再次，上级政府要给城市政府适度增压。如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创新城市政府积极履职尽责的考评制度，将“城市政府对驻地高校的管理和建设成效”纳入省对市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设计相关指标体系，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以此来确保给城市政府授权管理高校的效果。与此同时，应推动城市政府建立完善城市高等教育发展评价体系，建立起更加科学务实管用的考评机制，引导和要求高校积极建设与发展需求相吻合的学科专业，培养与城市发展需求相相辅相成的高素质人才，增强高校积极为城市发展服务的责任感。

二要为市场放权和增资。针对市场参与动力不足等挑战，首先要对市场参与高等教育发展多放权。在顶层政策方面，省市两级政府应积极稳妥地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与高校治理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包括高等教育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中介主体和监管主体等，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公平、有序的高等教育市场环境 and 体系。在民办高等教育方面，应建立完善有利于中国特色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让市场资源放心、用心地向民办高等教育汇聚，既能够放心投资办学，又能安心、用心、倾心地开展内涵建设，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公办高校方面，应将能够交给市场做的事务都更多地交给市场，借助市场的效率提高办学效率，使高校腾出更多精力、财力用于内涵建设，积极推动市场资本与高校共同举办混合所有制的二级院系，更好地依托市场资源、对接市场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匹配度。同时，对于市场已经参与公办高校发展中的领域，如后勤服务、基本建设等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优化合作运营。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市场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职责。在更多地放权于市场的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市场应履行的职责、义务进行全面的制度化设定，并抓好执行监督和管控，确保及时防范和纠正市场不良行为以及市场失灵等问题发生，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三要向高校赋权和增资。针对高校从城市获得的推动力不强等问题，要设立一定的评价机制，评价监督城市政府对驻地高校的支持态度、力度和程度，评价过程中充分重视驻地高校意见，促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相关部门真正重视驻地高校的发展。其次，要增加对非省会城市高校的资金支持。非省会城市高校主体是省属或市属高校，来源于中央财政的资金很少，而城市政府和市财政给予省属公办高校的资金支持也是杯水车薪，市属高校得到的财政拨款基本上只够维持基本办学。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是城市政府增加对本市高校资金拨付力度。当然，国家和省级政府可在税费改革中给城市政府留出用于本地高等教育发展的财税比例或给予更多用于高等教育转移支付，可以使城市政府发展高等教育有更多财力支撑。另外，部属和省属高校通过国家和省市共建、合建模式以及市场合作等多种办学治校模式，既能获得国家或省级层面的资金、政策支持，还能获得驻地城市的资源支持，更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民办高校可以通过积极争取政府入股参与民办学校办学，通过公有资本的参与和政策支持，更好地吸引市场资源投资民办高等教育。

（作者系山东石油化工学院东营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城市与高校何以双向奔赴